

書品

中華書局·SHUPIN

一九九六年合訂本

館

1996/

55754



200557548

样本书

中華書局

SHUPIN SHUPIN SHUPIN SHUPIN



晚 情 杨玉明



書 品 1996 年第 4 期 1996 年 12 月出版

中華書局總編輯辦公室編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主 編 熊國禎

副主編 沈錫麟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印刷者 北京新興膠印廠

郵購洽購 中華書局讀者服務部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國內統一刊號 CN11—1357 定價:3.00 元

《中華文學通覽》即將出版

古典文學是中華文化的瑰寶，是全民族的財富，對此，人們或許需要溫故、知新，或許希望領略她的風采，或許想全面了解其漫長的歷史，或許願意認識一個個性格各異的作家，或許想尋找一條學習古典文學的入門途徑，《中華文學通覽》一書，正是為了滿足讀者的上述需求而編撰的。《中華文學通覽》是一套普及性的叢書，以淺顯而生動的文字，系統介紹中國文學史知識，引領讀者在此範圍內作一次愉快而又富于情趣的旅行，給讀者以領略古典文學的享受，使人們能夠輕輕鬆松地讀下去，于不知不覺中獲得知識，受到感染。編者力求使古典文學變得親切有趣，讓讀者在勞動之餘享受到閱讀的愉快，因此本書在分篇立目、行文風格等方面，不囿于傳統，不重複已往同類書籍的作法，而是獨辟蹊徑，特色鮮明。

本書主編為董乃斌，參與本書寫作的都是當今古典文學研究界優秀的中青年學者。書中包括先秦卷《文學肇始》、漢代卷《雄風振采》、魏晉南北朝卷《空谷流韻》、唐代卷《煌煌唐韻》、宋代卷《崇文盛世》、遼金卷《古道遺聲》、元代卷《大漠來風》、明代卷《燎之方揚》、清代卷《長河落日》、近代卷《暮鼓晨鐘》，共十種。

本書近期由中華書局出版。

《書品》——與著者讀者溝通的橋梁

傅璇琮

時間過得真快，我們總編室的同志，也是《書品》的責編，賈元蘇同志，前些日子告訴我，說《書品》創刊已經十周年了。記得1990年底，1991年初，《書品》創刊五周年時，曾組織過一次筆談，這些筆談文章，讀來很有味道，印象很深，好象還是昨天一般，不想一晃五年又過去了。唐朝詩人李商隱詠金陵在南朝的變遷，曾有一詩句，說“三百年間同曉夢”（《詠史》），很值得人玩味。三百年尚且如此，則五年更算不上什麼了。但近來翻閱這五年來《書品》的文章，使人吃驚的是，中華書局竟還是出了那麼多值得人評說的書，可見，盡管人事倥傯，文化還是能在時間上站得住腳的。

五周年筆談，我很欣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蔡鴻生先生的文章，他的題目是：《讀〈書品〉，學品書，一樂也》。這真是一語破的，道出不少人讀《書品》後的共同感受。這一樂，樂在哪裡呢？據我的體會，一是《書品》所品的中華版的書，或《書品》的評介文章，大多意趣高雅，不落俗套。中華書局所出的書，很多專業性較強，大多數人會覺得面太窄，達不到暢銷的商業標準。但就我所接觸的文史界朋友，倒覺得這些書是真正有用的。出版社應有文化學術意識。在目前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出版社當然不能忘記經營，而且要著意把經營搞好。但出版物並非是純粹的商品，也不能簡單地說把出版社推向市場。特別是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麼文化與學術應當是出版社的靈魂。

中華書局是具有八十多年歷史的一家出版社，在本世紀，經歷過不同的歷史階段。但無論是哪一個階段，中華書局總是與文化界、學術界有着廣泛而深切的聯繫與交往。不同年齡段的著者與讀者，一說起中華書局，總會產生一種帶有時代情味的意緒。這是因

為，中華書局這一老的出版社，在其八十多年的風雨歷程中，並不忘記文化意識與學術意識。也正是這一點，得到文史學界不少友人的好感與好評。

譬如《書品》1990年第1期北大吳小如先生在《讀〈游國恩學術論文集〉》一文中，對中華“不惜冒虧本風險而終於印成此書”，認為“其尊重學術、尊重前輩學者的遠見卓識，實在令人感佩”。杭州大學吳熊和先生在《書品》1991年第3期，寫《〈詞話叢編〉讀後》，也認為中華能再版唐圭璋先生的修訂本《詞話叢編》，這實在是“對不久前去世的唐圭璋先生的最好紀念”。對老一輩學者是如此，對中年學者，正如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蔡美彪先生在評介中華所出陳高華《元史研究論稿》時所說的，“八十年來，特別是近四十年來，中華書局為出版供學術研究之用的古籍和當代學人的學術著作，做了大量的工作，為我國學術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蔡先生評許為這是有“大家風度”（《書品》1992年第2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位老編審、著名唐代文史研究者朱金城，看到中華出版清人勞格的《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竟感慨萬分，認為此書的出版，“使我多年來的願望成為現實”，說“中華書局編輯部的卓識與遠見，尤其令人敬佩”（《書品》1992年第3期）。無怪乎羅繼祖先生難免帶有很大情緒地說，“出版界不景氣不知從哪一年開始的，一時全國黃色淫穢書刊在逐利書商貪婪的操縱下滿坑滿谷，流毒無窮”，而贊許“中華書局在這樣的風氣裡，不顧一切，照樣埋頭出他們所擔負的所整理好的古籍”（《書品》1991年第3期）。我在這裡不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情況確實如此。最近文學編輯室的同志告訴我，九十餘高齡的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鐘敬文先生，特地托人帶話，說他還沒有在中華出過書，頗感遺憾，他的一本論民俗文化的十餘萬字論文集，寧願不要稿費，還自己買一千多冊書，也要拿到中華來出書。日前陝西師大史念海先生寫信給我，其中說：“猶憶數年前，尊駕蒞臨西安，曾囑撰寫有關歷史地理學史一書”，並說“亦曾將尊囑轉告白壽彝先生，壽彝先生亦亟贊成，並告以早日應命”。史先生一再說此書寫成後願在中華出版。這些前輩學者殷切

期望之情，既是對中華學風的肯定，也是對中華工作的關切與鞭策。

以上是蔡鴻生先生所說的“樂也”之一。其二，則是《書品》的文章所說的多是實話，無論是贊許或批評，都不作虛語，更無時下流行的廣告語言，動不動就“天下第一”、“全球最佳”。尤其值得人讀的，是一些批評文章。在自己辦的刊物上，登批評自己出的書的文章，有時一期還不止一篇，有時還連續登，我想這在現在似還無第二家。奇怪的是，盡管有批評，這些書還是照樣有人買，有人讀。因為批評者的意見是中肯的實事求是的，他們雖是批評，但認為書還是好書，缺點或錯誤，有個整體估量的問題，這在有識者是心裡明白的。至于有時候報紙上登一條有轟動效應的文章，把某一本書的錯誤作不適當的誇大，這也不要緊。出版社應當有一種氣量，應經得起批評，經受得住無端指責，甚至攻擊和謾罵。古人云，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一個學者，一個出版社，他（它）有多少份量，是有公論的，要有杜甫所說的“不廢江河萬古流”的器識與度量。我想，這也是《書品》之能得人好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最後還要說一點的是，《書品》上有不少篇文章是中華編輯部的人寫的。我做過三十多年編輯，深知編輯工作的甘苦。文革前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同志說過一句名言，說編輯好象理發師，一本書稿來了，好象進來一個要理發的人，頭髮蓬鬆，胡子滿臉，經過編輯仔細審讀加工，書稿乾乾淨淨印了出來，好象這位客人頭髮整齊，滿臉紅光，出了店門。因此，一位責編是最仔細的第一個讀者，他是最有發言權的評論者。我看了《書品》上幾位編輯同志的文章，深為文風的于平實中創新而欣慰。

我曾說過，回顧本世紀的出版史，凡是能在歷史上占有地位的出版社，不管當時是賺錢或賠錢，它們總有兩大特點，一是出好書，一是出人才。我們一提起過去的商務，總會自然想起張元濟、沈雁冰、鄭振鐸、傅東華；一說起開明，就會想起夏丏尊、葉聖陶、徐調孚、周振甫。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有馮雪峰、周紹良、顧學頤、王利器、舒蕪；而中華書局當時則有張政（下轉 16 頁）

書品目錄

1996 年第一期

總第 41 期

- 《書品》——與著者讀者溝通的橋梁 傅璇琮(2)
- 我與大曆詩研究 蔣寅(5)
- 寫在《大曆詩人研究》出版之際 謝思煒(12)
- 評張毅《宋代文學思想史》 張涌泉(17)
- 《往五天竺國傳箋釋》校議 江耕(23)
- 宋人筆記的校勘與注釋 汪聖鐸(28)
- 讀劉永翔教授的《清波雜誌校注》 羅繼祖(31)
- 我讀《續資治通鑑長編》 陳祖武(40)
- 羅鄭之間 舒萍(47)
- 《鄭孝胥日記》讀後感言 胡振龍(50)
- 《榕村語錄》與清初學術 沈繼延(55)
- 數詞與簡縮語 崔文印(61)
- 試為《漢語數目詞詞典》正名 中華書局最近新書(63)

書品目錄

1996 年第一期

總第 41 期

- 《書品》——與著者讀者溝通的橋梁 傅璇琮(2)
- 我與大曆詩研究 蔣寅(5)
- 寫在《大曆詩人研究》出版之際 謝思煒(12)
- 評張毅《宋代文學思想史》 張涌泉(17)
- 《往五天竺國傳箋釋》校議 江耕(23)
- 宋人筆記的校勘與注釋 汪聖鐸(28)
- 讀劉永翔教授的《清波雜誌校注》 羅繼祖(31)
- 我讀《續資治通鑑長編》 陳祖武(40)
- 羅鄭之間 舒萍(47)
- 《鄭孝胥日記》讀後感言 胡振龍(50)
- 《榕村語錄》與清初學術 沈繼延(55)
- 數詞與簡縮語 崔文印(61)
- 試為《漢語數目詞詞典》正名 中華書局最近新書(63)

《書品》——與著者讀者溝通的橋梁

傅璇琮

時間過得真快，我們總編室的同志，也是《書品》的責編，賈元蘇同志，前些日子告訴我，說《書品》創刊已經十周年了。記得1990年底，1991年初，《書品》創刊五周年時，曾組織過一次筆談，這些筆談文章，讀來很有味道，印象很深，好象還是昨天一般，不想一晃五年又過去了。唐朝詩人李商隱詠金陵在南朝的變遷，曾有一詩句，說“三百年間同曉夢”（《詠史》），很值得人玩味。三百年尚且如此，則五年更算不上什麼了。但近來翻閱這五年來《書品》的文章，使人吃驚的是，中華書局竟還是出了那麼多值得人評說的書，可見，盡管人事倥傯，文化還是能在時間上站得住腳的。

五周年筆談，我很欣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蔡鴻生先生的文章，他的題目是：《讀〈書品〉，學品書，一樂也》。這真是一語破的，道出不少人讀《書品》後的共同感受。這一樂，樂在哪裡呢？據我的體會，一是《書品》所品的中華版的書，或《書品》的評介文章，大多意趣高雅，不落俗套。中華書局所出的書，很多專業性較強，大多數人會覺得面太窄，達不到暢銷的商業標準。但就我所接觸的文史界朋友，倒覺得這些書是真正有用的。出版社應有文化學術意識。在目前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出版社當然不能忘記經營，而且要著意把經營搞好。但出版物並非是純粹的商品，也不能簡單地說把出版社推向市場。特別是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麼文化與學術應當是出版社的靈魂。

中華書局是具有八十多年歷史的一家出版社，在本世紀，經歷過不同的歷史階段。但無論是哪一個階段，中華書局總是與文化界、學術界有着廣泛而深切的聯繫與交往。不同年齡段的著者與讀者，一說起中華書局，總會產生一種帶有時代情味的意緒。這是因

為，中華書局這一老的出版社，在其八十多年的風雨歷程中，並不忘記文化意識與學術意識。也正是這一點，得到文史學界不少友人的好感與好評。

譬如《書品》1990年第1期北大吳小如先生在《讀〈游國恩學術論文集〉》一文中，對中華“不惜冒虧本風險而終於印成此書”，認為“其尊重學術、尊重前輩學者的遠見卓識，實在令人感佩”。杭州大學吳熊和先生在《書品》1991年第3期，寫《〈詞話叢編〉讀後》，也認為中華能再版唐圭璋先生的修訂本《詞話叢編》，這實在是“對不久前去世的唐圭璋先生的最好紀念”。對老一輩學者是如此，對中年學者，正如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蔡美彪先生在評介中華所出陳高華《元史研究論稿》時所說的，“八十年來，特別是近四十年來，中華書局為出版供學術研究之用的古籍和當代學人的學術著作，做了大量的工作，為我國學術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蔡先生評許為這是有“大家風度”（《書品》1992年第2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位老編審、著名唐代文史研究者朱金城，看到中華出版清人勞格的《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竟感慨萬分，認為此書的出版，“使我多年來的願望成為現實”，說“中華書局編輯部的卓識與遠見，尤其令人敬佩”（《書品》1992年第3期）。無怪乎羅繼祖先生難免帶有很大情緒地說，“出版界不景氣不知從哪一年開始的，一時全國黃色淫穢書刊在逐利書商貪婪的操縱下滿坑滿谷，流毒無窮”，而贊許“中華書局在這樣的風氣裡，不顧一切，照樣埋頭出他們所擔負的所整理好的古籍”（《書品》1991年第3期）。我在這裡不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情況確實如此。最近文學編輯室的同志告訴我，九十餘高齡的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鐘敬文先生，特地托人帶話，說他還沒有在中華出過書，頗感遺憾，他的一本論民俗文化的十餘萬字論文集，寧願不要稿費，還自己買一千多冊書，也要拿到中華來出書。日前陝西師大史念海先生寫信給我，其中說：“猶憶數年前，尊駕蒞臨西安，曾囑撰寫有關歷史地理學史一書”，並說“亦曾將尊囑轉告白壽彝先生，壽彝先生亦亟贊成，並告以早日應命”。史先生一再說此書寫成後願在中華出版。這些前輩學者殷切

期望之情，既是對中華學風的肯定，也是對中華工作的關切與鞭策。

以上是蔡鴻生先生所說的“樂也”之一。其二，則是《書品》的文章所說的多是實話，無論是贊許或批評，都不作虛語，更無時下流行的廣告語言，動不動就“天下第一”、“全球最佳”。尤其值得人讀的，是一些批評文章。在自己辦的刊物上，登批評自己出的書的文章，有時一期還不止一篇，有時還連續登，我想這在現在似還無第二家。奇怪的是，盡管有批評，這些書還是照樣有人買，有人讀。因為批評者的意見是中肯的實事求是的，他們雖是批評，但認為書還是好書，缺點或錯誤，有個整體估量的問題，這在有識者是心裡明白的。至于有時候報紙上登一條有轟動效應的文章，把某一本書的錯誤作不適當的誇大，這也不要緊。出版社應當有一種氣量，應經得起批評，經受得住無端指責，甚至攻擊和謾罵。古人云，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一個學者，一個出版社，他（它）有多少份量，是有公論的，要有杜甫所說的“不廢江河萬古流”的器識與度量。我想，這也是《書品》之能得人好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最後還要說一點的是，《書品》上有不少篇文章是中華編輯部的人寫的。我做過三十多年編輯，深知編輯工作的甘苦。文革前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同志說過一句名言，說編輯好象理發師，一本書稿來了，好象進來一個要理發的人，頭發蓬鬆，胡子滿臉，經過編輯仔細審讀加工，書稿乾乾淨淨印了出來，好象這位客人頭發整齊，滿臉紅光，出了店門。因此，一位責編是最仔細的第一個讀者，他是最有發言權的評論者。我看了《書品》上幾位編輯同志的文章，深為文風的于平實中創新而欣慰。

我曾說過，回顧本世紀的出版史，凡是能在歷史上占有地位的出版社，不管當時是賺錢或賠錢，它們總有兩大特點，一是出好書，一是出人才。我們一提起過去的商務，總會自然想起張元濟、沈雁冰、鄭振鐸、傅東華；一說起開明，就會想起夏丏尊、葉聖陶、徐調孚、周振甫。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有馮雪峰、周紹良、顧學頤、王利器、舒蕪；而中華書局當時則有張政（下轉 16 頁）

我與大曆詩研究

——寫在《大曆詩人研究》出版之際

蔣寅

我最初對唐詩發生興趣，是在高中畢業後待業的一段時間。閒在家裡沒事，偶然在同學處見到王力先生的《詩詞格律》，便借來看，繼而學着作。當時讀的第一部詩集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編的《李白詩選》，我對李白的喜愛也是從那時開始的。但我至今未寫過一篇專論李白的論文，我一直覺得，太白、東坡這樣的天才與智者決非我現有的學養、才具所能批評，所以盡管我對太白、東坡都懷着最深的景仰，卻從未想到以他們來作我研究的起點，而是最終選擇了大曆詩人作為學位論文的題目。

我對大曆詩人產生興趣純屬偶然，這應該歸功于 1979 年中華書局標點本《全唐詩》的重印。當時我就讀于揚州師院中文系，定價 39 元的《全唐詩》，對我來說遠比今日大學生買 400 元一部的《全唐文》更貴。但說不清出于什麼動機，我竟節省了兩個月的零化錢，又出讓了《詩學》、《歌德談話錄》等幾本很搶手的書，買了一部。此後一有空就一卷卷翻它，翻着翻着發現了問題。先是讀陳子昂詩，覺得羅庸先生撰的年譜不無可商，還曾琢磨了一陣。因為看熟了陳子昂詩，瀏覽戴叔倫詩到《暉上人獨坐亭》一首就產生了懷疑。陳子昂詩中也有個暉上人，陳集《酬暉上人秋夜獨坐山亭有贈》一詩，與戴詩同用禪、泉、玄、緣押韻，內容也相呼應。我推測戴集《暉上人獨坐亭》就是暉上人原唱之作，題中“暉上人”本是作者名，後竄入詩題，又訛為叔倫詩。再看集中《送崔融》、《游少林寺》，用韻與內容也與陳子昂、沈佺期同題詩合若符節，我愈覺這些詩可疑。另外，集中《寄孟郊》、《寄劉禹錫》、《冬日有懷李賀長吉》、《宿無可上人房》等與中唐詩人酬唱之作也與叔倫行年不合，十分可疑。限于學識與借書的條件，我心存疑問，卻未能進行考索求證。

1981年我考取廣西師院中文系研究生，專攻唐宋文學。第一年讀的都是先秦課程，第二年進入專業閱讀，將研究生資料室的《全唐文》借回宿舍，前後翻了兩三遍。這時我開始考究戴叔倫詩的竄偽問題，恰讀到傅璇琮、富壽蓀先生的辨偽文章，深受啟發。遂從追尋作品出處、考察典故名物起源、比較版本異同幾個方面入手，檢閱了大量文獻，尤其是明人集子，繼兩位前輩之後又考出幾十首混入戴集的唐、宋、元、明人作品，並斷定戴集的偽作決非一般誤收，而是明人有意作偽。這些發現極大地鼓舞了我，到定學位論文題目時，我向胡光舟老師提出了在整理現存詩集的基礎上研究戴叔倫詩歌創作的計劃，得到允許。經過半年多的準備，我開始編訂、校勘、注釋戴叔倫詩集，將現存詩作分為編年、不編年、備考、偽作四個部分。前兩部分收見于唐宋典籍的較可信的作品，凡無唐宋典籍依據、暫時又不能證偽的作品均編于“備考”。為謹慎起見，“備考”未予注釋，研究中也不加徵引。現在看來，這麼處理是可取的，因為有些作品感覺不像唐詩，後來又陸續發現確是明人作品。詩集的注釋、校勘用了三個月時間，後經增訂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學位論文以《戴叔倫研究》為題，寫成一個四萬字的綜合研究報告，第一部分作品考述，第二部分生平考證，第三部分創作研究，分別發表在《中華文史論叢》、《文史》、《文學遺產》上。

應該說，《戴叔倫研究》的重點主要在考證，批評的部分並不令人滿意。盡管我努力從整個大曆詩的背景來把握戴叔倫詩歌的獨特風貌，可實際的批評還是顯得粗糙和浮泛，自己也覺得未觸及深層的內涵。我甚至能感覺到那內涵的存在，卻就是無法貼近它。那種力不從心的感覺，至今還停留在記憶中。胡光舟先生在指導論文中，曾給了我各方面的訓練，使我能完成碩士論文。但我知道自己實在還不能勝任這樣專門的研究，由是特別渴望獲得進一步深造的機會。

如果不是考取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而是走上工作崗位，那麼我將不會寫出《大曆詩風》和《大曆詩人研究》。不祇是能力的問題，還有學術方式。以我的興趣，喜歡泛讀，好考據，思考問題常是綜合

式的，拙于分析。這種氣質或許更適于研究歷史，而不適于文學批評。如果不是師從程先生，我也許就憑着興趣，靠以前積累的資料，做些大曆詩人的生平考證，逐步走上文獻或歷史研究的道路上了。程先生的學問，在史學、文獻學、文學史、詩學諸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他對學生的要求也是融匯貫通，不拘方隅，希望學生在理論思維、文獻掌握和藝術鑒賞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發展。根據我的情況，先生開了《詩經》、《楚辭》、《莊子》、《左傳》、《史記》、《文心雕龍》六門課，要求各寫一篇作業，達到省以上刊物發表的水平。在程先生及周勳初先生耳提面命的指導下，經過六部書的研究，我感到把握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增強了，論文寫作水平也有所提高。當我在課餘將舊日有關包佶、獨孤及、梁肅、權德輿生平的考證整理成文時，所關注的已不祇是若干作家的事迹，而逐漸萌發全面研究大曆詩人與詩歌創作的願望。在清理事實的過程中，歷史事件背後的文學史意義不斷地呈現出來：包佶生平考證，促使我思考大曆詩人與當時財政活動的關係；梁肅年譜的編製，讓我看到大曆時期天臺宗對士大夫的影響；獨孤及文繫年，啟發我注意蕭李集團與文壇主盟者地位的變化；權德輿年譜的整理，則讓我重新考慮大曆作為詩史時段在時間上的跨度。這些文章發表時祇是純粹的考據成果，可我的收穫卻是由此生發出的詩史問題。以前讀大曆詩的印象，此刻逐漸清晰起來。一個對大曆詩的完整敘述，伴隨表達它的衝動終於在心中醞釀出來。很快我的提綱就作為博士論文的設想交到老師手中，程先生對我的想法給予熱情的鼓勵，並在研究方法和觀點上作了原則性的指導。

衆所周知，關於大曆詩歷來有定論，聞一多先生對大曆詩歌創作的總體判斷（《聞一多論唐詩》），程千帆先生在《唐詩鑒賞辭典》序言中對大曆詩內容、藝術作的評價，羅宗強先生《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對大曆詩美學風貌的描述，儲仲君、葛曉音、趙昌平論文對大曆詩人的批評，都可以說是準確而深刻的。有這些成果作基礎，我不禁對自己的工作充滿信心。然而，當我依據現代詩歌批評理論和方法建立起自己的研究模式，按自己理解的詩史過程進入分析

後，卻發現問題遠非我想象的那麼簡單。我對大曆詩的印象實在還很浮薄，很粗糙。——倒不在于我的結論缺乏新銳之處，而在于所有結論的艱于論證。對人文科學而言，現代學術範式更強調的是結論達成的方式及過程，而不是結論本身。因為許多結論僅憑直覺的靈感或模糊的印象就能獲得，可是要將這些結論付之清晰、深刻、有邏輯力量、有說服力的論證，卻是相當艱難的。從明代以後，誰都能將唐詩源流作一番宏觀論述，可是至今卻無一部將唐詩源流梳理得很清楚，提供一個令人信服的深刻分析的唐詩史。事情就是這樣，給你一千字的篇幅論唐詩，你可以文不加點，一揮而就；給你一萬字，就需要費神思考；而當你準備用二十萬字的篇幅來討論時，你將不敢輕易下筆。實證及其精緻化是人文科學許多領域愈益感到緊迫的問題。在我看來，唐詩尤其是大曆詩的研究已到了這樣一種境地，即解釋和說明現有的結論要比提出新的結論更難。鑒于此，一進入研究階段，我首先就將自己的目標定位在融合和解釋現有的結論上。

我花了不少時間搜集古今對大曆詩的判斷和評價，從中篩選出可供討論的問題，再以自己建立的研究模式去觀察分析它們，由此形成論文的基本框架和內在邏輯。論文題目徵得程先生同意，定為《大曆詩風》。在我的構想中，它將是對大曆詩的一個綜合性研究。所謂“詩風”不等于風格，而是意味着當時詩歌創作的總體風貌，包括詩人對詩體、風格的趣味，寫作的環境和動機，作品的主題與表現的特點，詩人群體的劃分和相互間的關係，大曆詩歌對唐詩乃至整個詩史的意義等等。這樣一個計劃規模是相當龐大的，無論我的知識準備還是時間都不允許。最後，我祇做了計劃中的前編——對大曆詩歌總體風貌的綜合分析。因為大曆詩總體上是共性大于個性，群體風格鮮明而個性色彩淡漠，從整體上把握大曆詩的風貌，更能說明處於詩史轉折點上的大曆詩歌承前啟後的意義。我的工作從抽樣分析開始，首先從分別代表開天和大曆時代詩歌眼光的兩個選本——《河嶽英靈集》與《中興間氣集》入手，比較、概括各自在審美風尚、藝術傾向方面的差異，提出詩風嬗變的假說：對

社會生活的態度由浪漫變得現實，對詩歌的趣味由推崇漢魏風骨轉向欣賞六朝韻致，對詩體的好尚由古體轉向近體，題材選擇由表達理想、感興詠懷轉向日常生活、身邊瑣事。然後我逐一分析大曆詩人心態、藝術理想、主題取向的變化，揭示大曆詩在寫作方式、作品構成、體裁風格等方面的特點，最後論定大曆詩的得失與影響。當看到實證研究的結論與抽樣分析的假說相符時，我的欣慰可以想見。

論文的寫作用了十個月時間，由于外圍資料已掌握，基本上是邊讀作品邊做卡片邊寫作，具體思路純粹是在寫作中形成與完密的，全文寫完共十六萬字。評審專家一致肯定我對大曆詩風內涵的概括和分析，已故沈玉成研究員特別稱許論文在研究方法上的獨創與有效，讓我感到自豪。平心而論，論文的觀點與結論很難說有多少新穎發明——大曆詩風的新變大抵前輩已言，而我提出的一些觀點，如吏隱問題、盛唐詩中主客體的對峙、情景交融的意象結構方式成型于大曆詩等，還並不一定能為學術界接受。但論文在獨特的研究方式與表述框架中展開的整個研究過程，將前人源于感覺印象的籠統判斷演繹得細緻、清晰，使“氣骨頓衰”（胡應麟）、“移風骨之賞于情致”（胡震亨）這樣的抽象結論成為有分析過程支持的、可以驗證的觀點，這是有意義的。我為自己設計的研究和表述的框架，今天看來不過是若干研究角度的組合，無甚特別出色之處。但當時不僅在國內無先例可循，就是在海外的研究中也沒有現成的模式可借鑒。更何況論文寫作的1987年，新方法的提倡還停留在口號上，人們更多地是在討論新方法的可行性問題。它在那時出現，自然是方法論上給人的新鮮感多些。《大曆詩風》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1995年在中國社科院第二屆青年學術成果評比中獲二等獎。可惜沈先生已看不到了，否則他也會感到欣慰的。

由于時間限制，計劃中的後編作家、流派研究未能在博士論文中完成。這部分內容的闕如，使《大曆詩風》未能深入到大曆詩內部，把握它自身發展的過程及對詩歌傳統的參與，整個分析略顯單